

周恩来与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

□ 高国荣

周恩来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杰出才干和非凡智慧为国内外所称道。但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还对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

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

周恩来较早就关注环境污染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生态破坏和工业污染问题已经出现。大面积开垦草原、围湖造田、滥伐森林导致了生态恶化、主要江河湖泊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当时，环境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识上也存在偏差，有的人认为污染只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些国家的不治之症，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周恩来清醒地正视国内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导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其加以关注。在1970—1974年间，周恩来对环境破坏及其治理作了多次讲话。1970年，周恩来谈道：“要消灭废水、废气对于城市的危害……如何搞好‘三废’的回收利用，要搞出规划。”1971年，周恩来在听取江汉油田汇报时指出：“污染是个大问题，要一开始就立足于解决。”1971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日本、美国、欧洲多国都存在严重的工业污染，“整个多瑙河都是黑的”，中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要引以为戒，“不能走老路”。1972年，周恩

来对治理“三废”问题作出指示：“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周恩来一再指出，要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环境保护，树立必须治理好污染的坚定决心。

支持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

周恩来高度重视联合国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从多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予以悉心指导。在联合国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人类环境会议的邀请后，周恩来毅然同意并决定派出高规格的中国代表团参会，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代表团人员构成上，周恩来提出了多部门派代表以及派高级别领导的建议。他指出，环境保护不只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应由综合管理部门组团并派出多部门的代表。在他的指示下，我国最终派出了4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部、卫生部、冶金部、农业部、水利部、外交部等多个政府部门，此外还有北京、上海和科技界的代表。周恩来亲自过目了代表团准备的会议发言稿，并指示他们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学习国外环境治理的有益经验。

斯德哥尔摩会议对中国代表团产生了很深的触动。在该会议之后，中国代表团通过比照分析，深刻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周恩

来对此高度重视，并指示筹备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我国环境保护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环境保护在中国的起步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国务院于1973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国务院已经动员有关部门和省市对全国环境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1973年8月5日至20日，国务院有关部委及各省市区负责人，以及工厂代表、科学界人士共300多人参加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确立了环境保护的32字工作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并对环保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本次会议将环境保护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极大地增进了各级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

在这次会议之后，国务院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部署。在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批转全国时，国务院提出了“三同时”制度，即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在开展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对其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随着该文件的批转，环境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74年10月，国务院成

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部、农业部、交通部、水利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负责人。此后，各地陆续成立了相应的环保机构，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并开展了以“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特色的污染防治。

“预防为主”与“综合利用”

周恩来创造性地将卫生部门“预防为主”的指导原则移植到环境保护领域，将其作为污染治理方针。在他看来，污染治理要从源头上进行积极控制，而不是在末端进行治理；要在预防上下功夫，而不是事后才补救。1972年，周恩来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说：西方已经走了先祸害再消除的“弯路”，我们的基本建设要从一开始就想办法，“才能免除祸害”。同时，他还反复提倡开展废物的“综合利用”。1971年，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部分代表时指出，我们要除公害，就“非搞综合利用不可”，要努力搞净化，变废水、废气、废渣“三害”为“三利”。在同年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时，周恩来看到高大烟囱冒出的滚滚黄烟，在听工厂领导拟将“黄烟”作燃料烧掉这一解决污染的办法时严肃指出：“烧掉是下策，放空跑掉是下下策，应当把它综合利用起来。”他一再强调“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对我国此后大力开展资源的循环利用提供了启示。



龙州起义纪念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城城东区的将军岭中央，纪念碑大体按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式设计，正面镌刻“龙州起义纪念碑”7个大字，背面镌刻邓小平的亲笔题词，背面基座刻有《龙州起义纪念碑简介》，全文如下：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左江革命根据地，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当时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龙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唯一一次高举反帝旗帜的起义，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志气，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缅怀世纪伟人邓小平和红八军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红八军的革命精神，2010年1月27日经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在迎来龙州起义80周年之际，龙州起义纪念碑于2010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

龙州起义纪念碑建于县城城东区的将军岭中央，纪念碑大体按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式设计，碑体造型庄严肃穆，雄伟壮观。纪念碑坐北向南，碑身高19.30米，通高30.21米，寓意着1930年2月1日是龙州起义的具体时间。基座宽15米，寓意当时左江地区的15个县是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基础。碑身宽7米，碑帽宽8米，寓意红八军是在红七军成立之后所创建的。碑体基座四面共雕刻浮雕9组，依次呈现了“胜利起义”、“邓小平领导建设党组织”、“土地革命”、“驱逐法国领事”、“清匪反霸”、“铁桥阻击战”、“凭祥阻击战”、“彩村突围战”、“红七红八军会师”等9个场景，充分展示中国红军第八军创建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纪念碑碑体正面镌刻“龙州起义纪念碑”7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背面镌刻邓小平同志的亲笔题词“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碑体两侧雕刻了当年红八军使用的帽徽图案。碑台主入口从碑园前平台至坡底有13组83级台阶与30米宽市政道路连接。台阶两侧各设置了6米宽的入园道路，市政路与主入口台阶之间设有停车场。龙州起义纪念碑工程根据用地特点，将纪念碑、道路、碑园广场和停车区布置在一条直线及直线两侧的位置，形成轴式构图，突出龙州起义纪念碑雄伟壮观的气势，也突出地展现了红八军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他们的光辉形象将永远巍然屹立在左江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辈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夺取胜利。

龙州起义精神光照千秋，红八军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碑文概述了龙州起义的重要战果与战略意义，也介绍了龙州起义纪念碑的历史和寓意，表达了对龙州起义革命先烈的崇敬敬意和深切缅怀。敬读碑文，令人肃然起敬，催人奋进。

胜利起义,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

1929年夏，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为巩固自身在广西的领导地位，有意与共产党开展合作，并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40多名党员干部到广西。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卓有成效地开展上层统战和兵运工作，建立党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并在左、右江地区恢复发展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10月中旬，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邓小平等当机立断，将革命武装挺进左、右江地区，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到龙州后，根据党的指示，立即武装工农，扩大革命力量，并及时平定叛乱，清除革命障碍。12月初，邓小平部署百色起义工作后，带领何世昌、严敏、潘邦亨等党员同志到龙州，召开20多人参加

一次高举反帝旗帜的起义

——龙州起义纪念碑碑文敬读

□ 支宇鹏

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中国红军第七、第八军，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决定。1930年2月1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左江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武装汇集龙州举行起义，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15日，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通讯》第二期发表讨论会记录，高度评价左右江起义“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

龙州起义胜利后，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颁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着手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部队分赴各地开展土地革命、剿匪反霸和反帝斗争，进一步发展工农武装和中共地方组织。红八军军委派甘湛泽、林礼、唐克等同志带领100多人的工作队，前往下冻区开展土地革命，各村屯相继实行土地共耕。革命运动引起了盘踞在龙州的法帝国主义势力的极大恐慌，他们派飞机入侵龙州上空，窝藏反动分子从事破坏活动。2月19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举行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大会，没收帝国主义在龙州的领事馆、海关、教堂等财产，将法国领事馆人员驱逐出境。

勇于斗争,保卫革命胜利成果

1930年3月20日，龙州军民在新填地广场举行何建南烈士追悼大会，红八军第一纵队正在靖西攻打叛军郑超部，军政大队学员也已到下冻开展工作，留守龙州的仅有红八军第二纵队两个营和左江工农赤卫队约2000人。国民党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梁朝晖率桂军5000多人水陆并进突袭龙州东门一带，红八军前哨部队在东门外与敌军发生遭遇战。下午，桂军及地方土匪武装以4倍于红八军的优势兵力攻城，兵分穿插到龙神庙和天后宫等地，企图对龙州守军完成合围。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和参谋长宛旦平等指挥留守龙州的红八军二纵队、工农赤卫队与敌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由于寡不敌众，桂军攻入龙州城内，西门和北门相继失陷。为掩护军部和主力部队转移，左江第一路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严敏率400多名战士为后卫，在龙州铁桥头展开了惨烈的阻击战，与敌人血战至夜晚后全部壮烈牺牲。

龙州失陷后，红八军军部和第二纵队被迫向凭祥转移。3月21日，部队行进至那堪村附近，与凭祥和明江两县团练交火，击溃敌人后，军部和第二纵队陆续到达凭祥。22日，桂军3个团进逼凭祥，为掩护主力部队向镇南关等方向转移，宛旦平等率300多人在鲤鱼山、白马山一线展开阻击。激战至中午1时，鲤鱼山屏山脚阵地失守，营长雷献祥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宛旦平等71名指战员在平而大青山下与黄飞虎匪部交战，弹尽后被俘，除了8人逃脱外，其余指战员全部被杀害。红八军第二纵队余部退至镇南关（今友谊关），后经宁明转移至宁宁吴圩等地，最后挥师征战十万大山。

红八军一纵队在滇桂黔边境转战数月，于10月在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村）与红七军会师。部队在河池整编后转战桂黔湘粤赣边界，跨越7000多公里北上抵达中央苏区。

旷伏兆：从挖地道、挖石油到挖隧道

□ 谢立宏 周书奎 梁德武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抗战时期，被日军惊呼为“奇幻战争”的中国地道战，是解放军军史、战史上的光辉典范。而这种战术的创始人，就是新中国首次授衔的中将旷伏兆。

挖地道藏奇兵，打得敌人魂飞胆战。旷伏兆1914年出生于江西永新，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指导员、营长、团政委等职。1943年3月，旷伏兆调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政委兼冀中地委书记。到任第二天，他在雄县杨庄一农户家听地委副书记杨英汇报时，村庄突遭日军包围，被匆匆隐藏在到这家的“蛤蟆蹲”里躲避而侥幸脱险。事后，他觉得这样太危险，设想将分散在各家各户的“蛤蟆蹲”挖通连起来，并作为新的斗争形式。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时任10分区司令员刘秉彦的全力支持。随后，他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召开党政军民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在二联县米南庄进行试点，与乡亲们一起挖洞掘土，就地解决难题，创造性地建起了能打、能走、能攻、能守的战斗地道，使得整个村庄成为完整的“天（房上）、地（地面）、阴（地下）三通”战斗堡垒村。接着，旷伏兆又将这一经验推广至地委辖区的（北）平、（天）津、保（定）地区，将原本散落在家家户户的“蛤蟆蹲”建设成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地下长城。旷伏兆发明的战斗地道充分发挥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以守代攻、以逸待劳的村落游击战的作用，能持久坚持武装斗争，在平原游击战争中，逐渐成为其他各种斗争的支柱，是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196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此为原型

拍摄的战争故事片《地道战》，公映后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使抗战时期冀中的地道战名扬世界。挖石油寻宝藏，组织华北勘探会战。1960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任命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在高等军事学院深造的旷伏兆为地质部副部长，协助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党组书记何长工开展工作，主要分管石油勘探和与石油部的协同等生产工作，之后又任党组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到任后，旷伏兆熟悉工作后，即根据李四光针对黑龙江大庆和吉林扶余相继勘探出石油而作出的“看来松辽油区，大局已定，今后该是我们跳出门槛，往南移动”的科学判断，率地质学家朱复、关世聪以及地质部有关司局、政策研究室同志，奔赴松辽地区就勘探队伍南移问题展开调查研究。旷伏兆和工作组同志先是在长春听取了地质部基层地质、物探工作者意见，然后又转到哈尔滨听取石油部从事实际工作以及石油部和黑龙江省领导的意见并达成石油勘探共识：缺油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巩固国防和社会稳定的大事，为国家分忧就必须加快石油勘探速度，迅速形成石油生产能力。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通过会战加快勘探，形成石油生产能力。其间，旷伏兆与黑龙江和石油部领导会商确定，松花江以北以石油部为主组织会战，以南由地质部统一指挥。随后，旷伏兆又在地质部各勘探队伍中进行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的学习教育，在勘探队伍中有效树立了大局观。

1960年9月，地质部党组在天津组织召开了在我国石油勘探普查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华北石油地质工作会议，也称“天津会议”。会上，旷伏兆根据“松辽地区通过

会战加速勘探普查，今后石油地质勘探普查力量部署，重点应由松辽向辽河、渤海及华北地区转移”的实际，强调：为了打好华北战役，勘探普查工作力量部署必须采取重点突破与区域普查相结合的方法，统一规划，统一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紧密配合，互相衔接。在这次会上，旷伏兆基于对冀中情况的熟悉和情感，还提出了将博野拗陷点突破与区域普查相结合的方法，统一规划，统一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紧密配合，互相衔接。在这次会上，旷伏兆基于对冀中情况的熟悉和情感，还提出了将博野拗陷点突破与区域普查相结合的方法，统一规划，统一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紧密配合，互相衔接。在这次会上，旷伏兆基于对冀中情况的熟悉和情感，还提出了将博野拗陷点突破与区域普查相结合的方法，统一规划，统一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紧密配合，互相衔接。

旷伏兆在地质战线奋斗了15个春秋，为组织领导地矿、石油资源勘探开发，为地质队伍建设、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挖隧道修铁路，凿穿山梁贯通天堑。1978年5月，旷伏兆被任命为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吕正操领导下，主持党委日常工作。铁道兵是一支工部队，技术含量高，且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旷伏兆经常深入施工一线、科研单位、院校及工厂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解决问题。

1979年4月，他在太（原）岚（县）铁道兵第二师铁路施工工地视察时，听说位于吕梁山深处的崇山峻岭中的一座1000余米长的隧道在施工中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导致施工进度缓慢，立即驱车前往那座隧道亲自察看。隧道石质破碎，顶部不断往下滴水，接近坑道的部位，还有塌方的痕迹……他凭借在地质部学到的地质知识和积累的丰富地质经验，经过仔细观察岩

石构造，与现场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排除方案，很快解决了施工进度缓慢的问题，干部战士们称赞“旷政委是内行”。他在另外一座隧道施工工地视察时获知，因整体道床施工缺一种型号的钢轨，即将影响到工程进度，便立即通过同行的铁道兵司令部领导责成后勤物资部门请求鞍钢给予支援，七八天后，210吨钢轨顺利运到工地，确保了施工进展。

旷伏兆到铁道兵工作后，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小学生，认真学习铁路施工知识，虚心听取专家和官兵意见，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工作。他大抓部队的艰苦为荣、劳动光荣、当铁道兵光荣的“三荣”思想教育，有效激发和保持了铁道兵部队的旺盛斗志。他历经了京原线、宛石线战备铁路修建和引滦入津工程等重大任务，足迹遍布铁道兵部队建设和圆满完成国家赋予的铁路修建等重大任务作出了卓越贡献。

旷伏兆不管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也不管工作岗位如何变换，总能“挖”出一片新天地，创出一片新辉煌。这源于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胆忠诚，得益于他始终保持老红军政治本色和战斗作风，得益于他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尊重人才、尊重群众的科学精神。他“挖”出了一世辉煌，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永远值得学习和弘扬。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